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2 月 16 日）

1、《外交学人》刊文分析拜登执政时期的中俄关系

2 月 13 日，《外交学人》网站刊登伦敦国王学院讲师娜塔莎·库尔特（Natasha Kuhrt）和格拉斯哥大学讲师马辛·卡兹马斯基（Marcin Kaczmarski）的文章《拜登政府会否促使俄罗斯与中国走得更近？》。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转向遏止的变化为中俄两国的密切合作创造了条件。在能源、安全合作以及批判西方政治的领域中，两国关系蓬勃发展，但阻碍中俄双方形成全面联盟的因素仍然存在。双方都不想为对方有进攻性的政策背书，两国在经贸、投资和技术领域的合作有限。文章强调，维系中俄友好关系的因素是多重的：一是反美主义，即对美国权力和政策的共同敌对，谴责西方所谓的自由秩序，强调西方社会的内部矛盾；二是规范一致的伙伴关系。俄罗斯不认为中国崛起会威胁其政权合法性，中国亦对俄罗斯的大国自尊有所维护,但双方都不愿意被对方捆绑而失去自有回旋余地。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2/will-the-biden-administration-push-russia-and-china-closer-together/

2、《国家利益》：重塑美国国务院，从基层做起

2 月 14 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大西洋月刊》外事记者、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题为“重塑美国国务院，从基层做起”的文章。作者认为，为维护和改善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措施，重塑美国国务院。但这一改变应从基层开始做起，尤其是从注重提升驻外人员的素质开始。作者指出，在数字媒体时代，国家高层决策者不能停留在“知道”遥远地区和国家所发生的事件，而要对其有精细的认识，通过驻外人员获取一手的信息和经验，以避免做出错误决策。美国驻外使领馆不仅要开展外交外事活动，同时也担任着报告所驻地情况的职能。作者指出，一名卓越的外事官员需要像优秀多产的作家那样，走出使领馆，深入所在国腹地去了解情况。他们需要打破公式化的、非敌既友的分类模式，着力描绘其中细微的区别，个中微妙能够为外交政策实施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重塑国务院不仅要求纠正特朗普时期唯政治任命的做法，或仅仅提高部门预算，还意味着重新强调驻外使馆的报告职能，强调驻外人员发展地区国别的专长。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ebuilding-state-department-ground-178118

3、《华盛顿邮报》刊文分析美国在缅甸事务中的话语权及拜登政府对缅甸政变的影响力

2 月 12 日，华盛顿邮报刊登其专栏作家乔什·罗金（Josh

Rogin）撰写的文章《拜登正在缅甸做着正确的事情。但这有意义吗？》。文章认为，虽然拜登团队以卓越的能力和迅速的行动应对了缅甸的危机，但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制定的政策可能不会为缅甸的局势带来很大的改变，因为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削弱。过去特朗普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没有投入必要的精力和资源来维持美国在缅甸的重要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和参与已经超过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总和。作者认为，缅甸军方接管政权反映出特朗普总统“美国优先”政策的失败，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处理外交事务上的无能。缅甸的动荡只会是这一政策导致的一系列连环后果的第一项，而不会是最后一项。面对影响力大大削弱的现状，即使拜登政府为其他国家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其影响恐微乎其微。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biden-is-doing-the-right-things-on-myanmar-but-will-it-matter/2021/02/11/8bfa2164-6cae-11eb-ba56-d7e2c8defa31_story.html

4、《国家利益》：缅甸变局表明选举制度的重要性

2 月 14 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兰德智库高级政治学者肖恩·齐格勒（Sean Zeigler）题为“缅甸军事政变与近期选举：选举制度至关重要”的文章。文章指出，近期发生的军事政变表明了缅甸民主的脆弱性，在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作者就军事政变与选举之间的关系做出四点说明：一，军事政变通常发生在选举之后；二，军队首领通常不愿罢免民众支持度高的领导人和政党，政变失败意味

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可能挑起内战；三，对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的人士来说，选举结果表明了他们所面对的敌对政治势力的大小；四，选举制度至关重要，选票结果转换成政治选举结果的过程与选举结束后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大小有关。最常见的两种选举制度是多元制与多数制，在多元制下获得票数最多的党派或者领导人获胜，多数制则要求获胜者赢得多数选票。多元制的缺陷在于，获胜的领导人或党派有大量支持者的选票，但可能没有稳固的支持基础。研究表明多数制下的获胜者执掌政权后面临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较小，而多元制下的结果则不乐观。最后，作者指出，缅甸军队发动政变似乎表明昂山素季和民盟已经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但军事政变本身恰恰说明昂山素季和民盟没有在近期选举中获得足够多的支持来与军方相抗衡。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myanmar%E2%80%99s-coup-and-its-recent-elections-institutions-matter-178128

5、《华盛顿邮报》：普京的最新行动可能会使美国媒体在俄罗斯陷入僵局

2 月 13 日，《华盛顿邮报》编辑委员会发布文章《普京的最新行动可能会使美国媒体在俄罗斯陷入僵局》。文章指出，美国国际媒体署（USAGM）正在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压力。俄罗斯政府意欲向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和美国之音（VOA）在俄罗斯联合运营的电视台收取高额罚款，并向其工作人员提起诉讼，将电视台的报道定性为“外国特工的产品”。作

者分析，普京政府的意图十分明确，即迫使美国媒体关闭在俄罗斯的业务，以打击过激的反对声音，稳固自身政权。由于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受影响的媒体可能不得不停止在俄罗斯的运营。与此同时，普京关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的方案可能会被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效仿，这将对美国媒体在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话语权及影响力造成巨大的影响。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putin-targets-rfe-rl-current-time/2021/02/12/cdccb85c-6afd-11eb-9ead-673168d5b874_story.html

6、《华尔街日报》：谁是新冠起源的调查者？

2 月 15 日，《华尔街日报》编委会（The Editorial Board）发表观点文章《谁是新冠起源的调查者？》。文章称，全球都应不遗余力地探求新冠起源，且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中国官方的不合作及世卫组织内部的利益分歧使得这项调查结果备受质疑。文章认为，由于中国政府的“管控”，最近为期 12 天的世卫代表团武汉之行仅获得去年武汉疫情暴发时有限的原始数据，对了解起源并无太大帮助。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强调新冠可能通过冻品进口、人畜共患或实验室传播等方式自境外传至中国，但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冠状病毒研究，美国国务院声称，早在 2019 年秋天，该所多位工作人员曾患病，症状与新冠肺炎和普通季节性疾病都非常相似。此外，文章指出，虽然世卫组织肯定了调查团队地域及专业领域的分布均衡，但其中部分专家削弱了这种可信度，如《柳叶刀》新冠委员会成员动

物学家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这位出生英国的美国公民所在的组织资助了武汉病毒所数百万美元；以及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医疗中心病毒科学部门主任马里恩·科普曼斯（Marion Koopmans），十年前，正是她的副手修改了 H5N1 流感病毒，使得其能够在哺乳动物雪貂之间传播，一时间成为国际新闻。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o-are-the-covid-investigators-11613401955?mod=opinion_lead_pos3

7、《外交政策》：新冠疫情促使西方回归国家干预主义

2 月 13 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保罗·格博多（Paolo Gerbaudo）的文章《大政府的回归》。文章指出，新冠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回归。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更趋脆弱，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并且将失去自由市场的弹性。基于这一背景，美国内部出现了针对国家干预主义的诸多看法，对政策制定构成重大影响。其中的争议主要围绕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货币政策的重新制定与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的施行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第二，恢复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或有美中竞争与保护主义的色彩；第三，美国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与气候政策制定上有分歧；第四，国家干预主义会冲击美国数字经济；第五，政府干预会积压商界的利润；第六，反中央集权主义与反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影响较大。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2/13/big-government-is-back/

8、《经济学人》：英国成为发达国家中减碳排放力度最大的国家

2 月 14 日，经济学人刊物刊登文章《英国成为发达国家中减碳排放力度最大的国家》。文章指出，英国于 2020 年彻底脱离了煤炭供电，碳排放自 1990 年以来锐减了 44%，经济增长了三分之二。英国减排的成就显著，“气候外交”很有可能成为英国定义其脱欧后世界地位的基础。自从本世纪开始，去碳排放就成为了政治决策问题。长远来讲，单纯零碳排放发电还远远不够，更困难的是使供暖和交通运输也去碳化。英国的消费者偏爱漂亮但隔热差的老式房子，这种房子中使用天然气的供暖效果更好，而且英国街道狭窄曲折，安装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空间有限，因而减少供暖和交通运输产生的碳排放将很困难。文章认为，英国过去一段时间的减排政策值得赞颂，但未来可能会面临重重阻挠。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21/02/14/britain-has-reduced-its-carbon-emissions-more-than-any-other-rich-country

9、《外交政策》：莫迪运用印度软实力，但回报甚小

2 月 14 日，《外交政策》刊登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苏米特·甘谷利（Sumit Ganguly）的文章《莫迪运用印度软实力，但回报甚小》。文章指出，莫迪 2015 年上台伊始就成功劝说联合国将 6 月 21 日定为“国际瑜伽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背

书更被视为印度软实力到达高峰。但自此之后，印度软实力的效果则逐渐褪去。近期，新德里对大规模农民抗议的不作为更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莫迪对此无关痛痒的表态和对国际干预的谴责都是在削弱印度自诩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软实力基础。作者指出，诚然，莫迪所在印度人民党（BJP）的错误决定起到一定消极作用，但存在更为深刻的根源——印度数十年来对国际舆论就其国内政策的批评过于敏感。这种“过于敏感”塑造了印度的政治文化。国际批评越多，印度越变得自我防御乃至逆向而行。印度当局一系列作为显示出对“言论自由”的极大敌意，媒体人相继因报道农民抗议而被收押。印度自由民主的形象逐渐坍塌。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2/14/modi-india-power-farmer-protest-human-rights/

撰稿人：蔡依航、邓家骏、任怡静、牛颖卓、姚迟迟
审稿人：朱荣生、许馨匀